

当公益实践沦为海外名校的入场券……



一个名为“深圳女工赋权”的暑期调研项目最近上线,招募高中生去深圳工厂调研,并帮相关 NGO 发起公益筹款;可故事的另一面是,“公益调研”收费 1 万 5 千元,项目结束后可得到项目结业证书和导师推荐信。

这个令人熟悉又颇为讽刺的剧情,再次揭开了某些商业性公益项目的一角:机构搭台,准留学生唱戏,被“赋权”的边缘群体在“配合演出”。从义工旅行、国际志愿者、文化体验到田野营,瞄准不同受众的背景提升行业越来越火热:野生动物救助、边远地区支教、生态环境保护、社会问题调研、非遗文化传承……这些听起来光鲜、细看却变了味的所谓社会实践背后,是高等教育全球化催生的留学产业链,和每一个亟需润色简历的、越来越呈低龄化趋势的“准世界公民”。

抓住招生官的目光

即将迎来暑假的大二学生陈舟舟,走出了留学中介的大门,她刚刚结束了一场紧张的对话。中介老师在她的简历上圈圈画画,并根据她的情况做了未来一年里的“战略建议”,除了常规的托福准备,还有实习和一系列的志愿者活动,用老师的话来说,这叫“背景提升”。

在出国留学人数与日俱增的情况下,单凭学历和绩点已不足以打动顶尖的海外名校。陈舟舟不得不在本就优异的背景之外,寻找更多的突破口。

许多青年实践、义工旅行、志愿者招募的账号开始出现在她的社交媒体关注列表里。

动物救助、环境保护、志愿教学、医疗服务、非遗传承、田野调研……任何学科背景的学生都可以在其中找到“用武之地”,并得到一份国际认可的“志愿者证书”。

公益实践是欧美公共教育里最为常见的培养目标之一。二战以后,伴随着全球化,美国的公民教育目标开始从培养国家公民,转向塑造世界公民。成为一名“世界公民”,意味着学生要放眼世界,积极参与解决社会、政治、经济或环境等相关的问题。

在申请海外高校时,类似的志愿者经历能在简历锦上添花,让申请者在海量的申请信中抓住招生官的目光。

结合中介老师的意见,陈舟舟

最终选定了一项位于广西的志愿教学项目,她将给当地的留守儿童带去英语教学和其他趣味活动,上午上完课以后,还能在当地体验传统美食、游览生态村,她设想利用自己拍摄剪辑的专业技能,为这趟活动留下记录。为期一周的项目费用大约在两千五百元。

而陈舟舟之所以选择向中介机构付费参加志愿者服务,当然是因为这样比较“省事”和“安心”。其背后则源于公益实践在我国公共教育中的缺失,活动大都只停留在“假期去敬老院献爱心”和中学时期的“第二课堂”。直到大学,通过一些学校社团或青年志愿者协会,学生才可能接触到更多的志愿活动,但由于信息不对称,他们往往缺乏了解 NGO 等社会组织的渠道和学习社会工作知识的路径。

为了快速补齐这种“缺失”,针对海外高校的偏好,产业化的背景提升应运而生。这些项目快速直接地击中痛点,打包了集“同理心、证书、异域风情想象”于一体的一揽子计划。

“变味”公益遮蔽了什么?

通过华丽的宣传和推销,中介机构贩卖着“对他者的关怀”与“对异域的想象”,吸引准留学生们的参与,并收取高昂的费用。公益与商业的界限被模糊,志愿者的实践被私有化与商品化,使得实践经验、对弱势群体的关心都可以用金钱购买。

琳琅满目的项目在货架上标好价格等待被挑选,项目收费也进一步拉高了志愿服务的参与门槛。有经济能力的群体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接触到公益实践,从而成为“更具竞争力”的申请,一些热心公益但是没有经济能力的人,很容易对此望而



却步。

在欧美,去发展中国家参加志愿者旅行 (Volunteer Tourism / Voluntourism) 在上世纪 60 年代便掀起了热潮。大学生们利用间隔年或假期前往贫困的国家帮助有需要的人,以此回馈社会、丰富经历。北半球对南半球,西半球对东半球的关切,也彰显了“世界公民”的身份认同。

随着义工旅行团不断增多,相关产业也应运而生。半岛电视台就曾报道,在柬埔寨等国家已经出现当地组织自导自演的“孤儿院”项目——让贫穷家庭的孩子假扮孤儿跳舞来获取游客的同情和金钱。

即便抛开商品化的问题不谈,被包装起来的公益实践,到底是不是一件能实现其价值的商品?

一些媒体质疑,志愿者在前期并没有受到充分的培训,以陈舟舟打算报名的志愿教学的项目介绍为例,项目对志愿者培训、教学备课内容也甚少着墨。

而为期一周的义工旅行,又能否为当地提供必要的援助与支持呢?

由于这些项目的时间往往很短,志愿者只需要负责一些简单的任务。比如,在环保类的项目中,需要把小海龟送回大海、喂养鱼类、检测水质、种树等等,然而更多时候“志愿者”只是去听当地人分享如何保护环境的故事。志愿教学项目通常以夏令营趣味课的形式进行,或者只是和孩子们做朋友,让他们接触外界的新鲜事物。这些活动看上去很有意义,但在现实中却很难触及问题的根源。

项目设计的浮光掠影,让志愿者的参与浮于表面,甚至还可能导致对系统问题的回避。这些参与方式,使志愿者们很难思考造成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与肌理。譬如在环境问题的背后,我们能否看到全球垃圾处理流向的不平等?

像马拉维这样的非洲东南部国家,是义工旅行频繁光顾的目的地。一名马拉维“受助者”曾在自述中写道:“年轻的、不合格的人能够跳上飞机飞往马拉维

和边缘化,二者间的阶层差异,在变了味的“公益实践”中,被放大与再生产。

同理心该何处安放?

针对商业性公益项目的批判,也许会让不少对公益事业富有热忱的人感到困惑,怀有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朴素信仰有错吗?对欠发达地区怀有同理心、想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有错吗?我们还能怎样打破背景提升产业化中的困境?

心童第一次接触公益也是在大学的暑期社会实践,因为偶然的机会关注到了唇腭裂患者群体。为了不像学校其他社会实践那样“做形式主义的事情”,她和团队走访病房、接触医生和患者,了解唇腭裂患者的现状。

在病房里,她遇到一个 9 岁的小女孩。因为说话时无法被听清,她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说话,跟人交流时只是低着头沉默不语。

心童用笔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,尝试着开始了跟她的对话。与此同时,这个女孩正悄然在她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。

在医院,被问到关注唇腭裂是不是一时冲动,她说:“如果说我要做一辈子一定骗人的,但我能够承诺的是它绝不是一个夏天的事。”

大学毕业时,面临着众多方向的职业选择,她又想起这个小女孩和社会实践时的经历。如果可以让跟这个小女孩一样的孩子们可以开口说话,她“想不到不做这件事的理由”。

于是,学习创业的知识,创办起关注言语障碍者的社会企业,都变得顺理成章。那份“不止是一个夏天”的故事,至今已经走到了第六年。

当志愿者可以意识到自己的特权、不以“施恩者”自处而是平等地、真诚地与服务对象一同改变让他们遭受更多困境的结构性问题时,才能让服务对象的主体性得到尊重。在平等对话的过程中,不少孩子表示“长大后也要教人说话”,这让心童感到“温暖和善意是可以流动起来的”。

“如果没有深度调研过服务对象是否真的需要帮助、需要什么样的帮助,就去拉横幅拍个照,是不负责任的。”心童观察到的问题,很多人也开始意识到。一些年轻人已经开始尝试越过中介,拓宽自己获取信息的渠道,主动联系当地的 NGO,具体了解当地的问题所在。他们在到达目的地后,以更加细致的问题意识,追问具体的原因;结束服务之后,继续保持着对当地的关注。

或许,做公益从来都不需要去某个“远方”,而需要追逐某个“问题”。从具体的问题出发,看到具体的人,在每一次倾听和对话中,连结“附近”,连通生命。

(据青年志)



名为“深圳女工赋权”暑期调研项目的介绍页面